

阿拉伯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学转向

——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析论^{*}

赵琳^{**}

内容提要 阿里·瓦尔迪是20世纪伊拉克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框架的基础上，其研究对象经历了从社会学到历史学范畴的转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历史社会学思想。瓦尔迪的历史社会学思想以发掘伊拉克历史规律为研究重心，形成了机制性叙事与时序性叙事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探寻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原因为核心问题意识。瓦尔迪思想不仅对现实具有“揭示性”，对未来具有“预见性”，还影响了当代伊拉克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瓦尔迪是20世纪阿拉伯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同时还推动了伊拉克历史学的发展。他以社会学与历史学并举的研究方法突破了社会学与历史学间的壁垒，呼应了西方历史社会学的风潮，为伊拉克学者在世界历史社会学发展历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为突破西方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阿里·瓦尔迪 历史社会学 伊拉克社会史 游牧 定居

阿里·瓦尔迪（Ali al-Wardi，1913－1995），是20世纪伊拉克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被誉为“伊拉克社会学之父”“阿拉伯社会学第一人”。美国华盛顿前高级反恐顾问尤瑟夫·H.阿布勒-埃宁（Youssef H. Aboul-Enein）曾公开表示“没有深入研究过瓦尔迪笔下的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伊拉克人”。^①他主持编译了瓦尔迪代表作《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呼应”一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倭马亚王朝历史兴衰中的部落因素研究”（21XJC770009）资助。

** 赵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

① Ebubekir Ceylan, “Book Review of ‘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 by Youssef H. Aboul-Enein,” *The Historian*, Vol. 75, No. 4, 2013, p. 822.

的 11 篇文章相继发表在美国陆军杂志《装甲》（*Armor*）上。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册以《动荡中的伊拉克：阿里·沃迪博士的历史视角，从奥斯曼帝国到费萨尔国王》（*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① 之名出版。此外，2014 年 2 月 25 ~ 26 日，包括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国际当代伊拉克研究杂志社（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国际当代伊拉克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国际中东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阿拉伯社会科学理事会（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等在内的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同举办了“庆祝阿里·瓦尔迪 100 周年诞辰”学术论坛。^② 会议集合了来自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他们分享了对瓦尔迪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心得，可见瓦尔迪思想和作品很受关注。^③ 在众多对瓦尔

① Youssef H. Aboul-Enein, ed., *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

② “Sociology in Iraq: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Ali al-Ward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Vol. 8, No. 2&3, 2014, pp. 245 – 248.

③ 以学科分野为依据，学界对瓦尔迪的研究可归为两类。一类着重分析瓦尔迪的社会学思想，如哈米德·G. M. 哈希米（Hamied G. M. al-Hashimi）探讨瓦尔迪作品中的伊拉克人的双重人格问题；萨拉·帕希里（Sara Pursley）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瓦尔迪的“无意识”应用于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双重叙事；阿斯玛·阿卜杜拉·盖尼分析了瓦尔迪《素丹的传教士》一书中的社会学理论，并且认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维度。参见 Hamied G. M. al-Hashimi, “Iraqi Personality in Light of Ali al-Wardi’s Works: A Critical Review,” *Sociology Study*, Vol. 7, No. 1, 2017, pp. 1 – 6; Sara Pursley, “Ali al-Wardi and the Miracles of the Unconscious,”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Vol. 20, No. 3, 2018, pp. 337 – 351; [伊拉克] 阿斯玛·阿卜杜拉·盖尼《阿里·瓦尔迪在〈素丹的传教士〉中的历史社会学思想》（阿文版），《艾代布杂志》2017 年第 122 期，第 133 ~ 154 页。另一类侧重分析瓦尔迪的历史学贡献，如迪娜·里兹克·胡里（Dina Rizk Khoury）将阿里·瓦尔迪与汉纳·巴塔图对伊拉克历史的解读进行了对比。奥瑞特·巴什金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伊拉克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认为瓦尔迪的世俗与民主主张对伊拉克历史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阿德·贾比尔·哈蒂姆·祖弗里分析了瓦尔迪对伊拉克宗派主义的研究，认为他的研究结论来源于历史但用来解释现代伊拉克社会依然有效。参见 [美] 迪娜·里兹克·胡里《汉纳·巴塔图与阿里·瓦尔迪的伊拉克历史与社会》（阿文版），《欧么朗杂志》2018 年第 6 期，第 7 ~ 21 页；Orit Bashkin, “Advice from the Past: ‘Ali al-Wardi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Jordi, Tejel, Peter Sluglett, Riccardo Bocco, Hamit Bozarslan, *Writing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Histori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Hackensack, N. J.: World Scientific, 2012, pp. 13 – 30; Fouad Jabir Khadhem al-Zufri, “Sectarianism in Iraq-a Critique by Ali al-Wardi,”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7, No. 4, 2014, pp. 510 – 515。

迪的研究成果中，当代伊拉克史学家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Ibrahim Khalil al-Allaf）^① 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阿里·瓦尔迪的思想及其作品有助于形塑公众对伊拉克社会结构的认知，探究伊拉克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启发伊拉克历史学转向社会史、文化史领域。^② 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瓦尔迪作品的引入及其思想的研究暂付阙如。国外学界虽已认识到瓦尔迪思想中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但仍碍于学科分野缺乏对两个维度的整体性把握。本文从瓦尔迪思想中两个维度的生成、其历史社会学思想的特征和影响三部分对瓦尔迪思想进行综合性的考察，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抛砖引玉，庶几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

一 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的生成

阿里·瓦尔迪出生于巴格达卡迪米亚（Kadhimiya）区的一个传统什叶派家庭。瓦尔迪的姓氏源自其祖辈从事玫瑰花（al-wardi）水蒸馏工作。父亲希望他继承祖业，因此瓦尔迪于1924年辍学后在一家香水作坊工作，终因他沉迷读书置顾客于不顾而被辞退。1931年瓦尔迪开始在夜校继续高中学业，1932年他抛弃传统服饰，改穿西装，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被称为阿凡提（指在奥斯曼政府建立的现代学校中接受教育的阿拉伯人）。凭借高中所获得的优异成绩，瓦尔迪作为首批接受伊拉克教育部资助学生中的一员赴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于1943年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再次受资助赴得克萨斯大学继续求学，并分别于1948年、1950年获得该校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1年，瓦尔迪在巴格达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直到1970年退休。

毋庸置疑，瓦尔迪的研究始终保有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两个维度，但从他的创作历程来看，其研究对象显然经历了从社会学理论研究到历史时空

^① 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1945年至今），伊拉克历史学家，摩苏尔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阿拉伯历史研究，代表作有《当代伊拉克史》（1989）、《阿拉伯民族思想史》（2001）。

^② [伊拉克]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伟大且富有经验的伊拉克社会学家阿里·瓦尔迪的书信》（阿文版），文明对话网，2021年3月21日，<https://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712927>。

性研究的转向，换言之，从人格心理逐渐聚焦于现代伊拉克社会史研究。这样的转变与瓦尔迪所接受的西方社会学规训和个人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阶段，瓦尔迪的早期研究以社会学为主，历史学为辅。1950 年至 1954 年前后，瓦尔迪立足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从史实中获取支撑。这一时期历史学的面貌相对模糊，居于为社会学服务的客体地位。瓦尔迪于 1951 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伊拉克人的人格——现代社会学视角下的伊拉克人心理研究》（以下简称《伊拉克人的人格》）（*Shakhsiyat al-fard al-Iraqi: bahth fi nafsiyat al-sha'b al-Iraqi fi daw 'ilm al-ijtima' al-hadith*）^① 以伊拉克人的人格为研究对象，形成了自然环境决定伊拉克人的人格的观点。他认为“游牧与定居”之间的固有冲突是伊拉克社会矛盾（包括伊拉克人的人格）的主要因素。^② 在 1952 年出版的《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以下简称《无意识的奇迹》）（*khawariq al-laashueur 'asrar al-shakhsiat al-naajihā*）^③ 中，瓦尔迪将自己对伊拉克人的人格的观点进一步抽象化，提出“智力的框架”（al'iitar alfikriu）^④ 概念，重申了客观社会创造主观人格的观点。通过这两部早期著作，瓦尔迪阐明了“客观环境决定论”的基本观点。

该观点的形成与瓦尔迪长期接受西方社会学规训有关，换言之，西方教育经历搭建了瓦尔迪社会学理论框架，主要表现为他对西方学者思想的接纳。其一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无意识理论”。瓦尔迪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心理的认识，甚至引发了一场革命。它颠覆了 19 世纪的理性主义，使人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用自己意识的光芒来指引行为，可以通过意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⑤ 瓦尔迪在《无意识的奇迹》中指出：20 世纪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

^①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伊拉克人的人格——现代社会学视角下的伊拉克人心理研究》（阿文版），伦敦：沃拉格出版社，2009。

^②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2 册）（阿文版），巴格达：伊尔沙德出版社，1969，第 4 页。

^③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伦敦：沃拉格出版社，1952。

^④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 48 页。

^⑤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 141 页。

无意识（al-la-shu^cur）或隐藏的思想（al-^caql al-batin）传播得更广，无意识是灵魂深处潜在力量的存在。这些潜在力量驱使一个人以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塑造他的行为（suluk）。他将这种“无意识”理解为不被人所意识到的客观社会环境，他指出成功往往是“从无意识深处迸发灵感的结果”，^①成功的人往往不是付出最大努力的人，而是让自己无意识的力量爆发的人；意图、工作、努力和紧迫感都可以对抗无意识的力量。^② 其二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扎根于历史相对主义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他认为某个时代被人所认可的知识类型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故而他否认超越时空限制恒定真理的存在。用曼海姆的话说：人的思想并不是在某种社会真空中，而是在一种研究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③ 瓦尔迪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伊本·赫勒敦理论的社会学分析：知识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Ibn Khaldun’s Theor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中，从理想与现实主义、公理与强权、理性与宗教、伊斯兰与游牧四部分，分析了伊本·赫勒敦思想所体现的伊斯兰历史上的争议。他主张从伊本·赫勒敦所处社会与时代框架中揭示伊斯兰历史的真相，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如同这四组反义词一样绝对”。^④ 这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证明了曼海姆对瓦尔迪的影响。曼海姆认为他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之要义是摆脱社会学大而化之的概括，“证明自己（知识社会学）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从事实际研究的能力”。^⑤ 正如他对知识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间关系的分析，瓦尔迪第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学的同时不应否认其创作伊始即有的历史学维度。以瓦尔迪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一方面，瓦尔迪对伊本·赫勒敦的评价和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的层面。他将后者作为指导其思想的灯塔，认为伊本·赫勒敦在两个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理论学者：第一，他早在五个世纪以前已经从客观环境出发研究社会；第二，他是一

^① [伊拉克]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17页。

^② [伊拉克]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15页。

^③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李步楼、尚伟、祁阿红、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11页。

^④ Ali Husain al-Wardi,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Ibn Khaldun’s Theor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50, p. 15.

^⑤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李步楼、尚伟、祁阿红、朱泱译，第354页。

名真正的理论家并且对阿拉伯社会有着深入的研究。^① 瓦尔迪将伊本·赫勒敦视为阿拉伯人的黑格尔，他围绕着“游牧与定居”基本矛盾的社会哲学，摧毁了古代逻辑学家所信奉的法则。^② 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论文开展的是以伊本·赫勒敦为案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证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如何能够适应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体系。^③ 另一方面，在研究伊本·赫勒敦思想的过程中，历史的维度也无从回避。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早期伊斯兰历史占据了大量篇幅。论述部落精神时，他客观地指出了虽然穆罕默德力图通过宗教突破部落的界限，但是从哈里发时代到倭马亚王朝，部落精神在伊斯兰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历史背景构成了伊本·赫勒敦思想产生的历史框架。

第二阶段，瓦尔迪研究中历史学渐次反客为主。1954 年后瓦尔迪的创作引入历史维度的频率增多，1963 年后他的研究对象日趋历史化，最终聚焦于伊拉克社会史。历史逐渐成了瓦尔迪的研究主体，社会学理论成了分析历史的工具。

瓦尔迪 1954 年出版的《素丹的传教士》（*Wu'ath al-Salateen*）^④ 以乌莱玛阶层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是宗派主义的始作俑者。乌莱玛借宗派主义获取权力与地位，垄断真相以捍卫私利，他们本质上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佯装信教（实际上不信教）的人”。^⑤ 在 1955 年出版的《人类心灵的闹剧》（*Mahzalat al-Aql al-Bashari*）^⑥ 中，瓦尔迪回顾了早期伊斯兰历史中派系冲突出现的经过，分析了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之位的争夺，包括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阿里之间的分歧、欧麦尔和阿里追随者之间的争端、阿里和穆阿威叶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以此挖掘伊拉克派系冲突的历史成因。1963 年复兴党执政后，瓦尔迪彻底转向了以伊拉克社会史为对

^①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伊拉克社会性质研究》（阿文版），伦敦：库凡出版社，1996，第 21 页。

^②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 88 页。

^③ Ali Husain al-Wardi,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Ibn Khaldun’s Theor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50, pp. iii - iv.

^④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素丹的传教士》（阿文版），巴格达：马里夫出版社，1954。

^⑤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人类心灵的闹剧》（阿文版），贝鲁特：库努斯出版社，1994，第 299 页。

^⑥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人类心灵的闹剧》（阿文版），巴格达：拉比塔出版社，1955。

象的史学研究，力图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历史探索伊拉克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于 1965 年出版了《伊拉克社会性质研究》（*Dirasah fi Tabi'at al-Mujtama' al-Iraqi*），于 1969 年开始出版多卷本《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Lamahat ijtima'iyah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共六卷八册）。尤其是《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依照时间顺序对 16~20 世纪的伊拉克社会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别开生面的分析，是一套不折不扣的历史学著作。该书被誉为“伊拉克近代社会史的百科全书”。这一阶段，从分析方法看，瓦尔迪意识到就研究伊拉克社会而言，社会学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基于经验主义的历史学方法反而更为合适。他认为：“伊拉克社会不像美国社会，研究人员可以敲开他们家门问家庭主妇任何问题。”^① 因此，瓦尔迪拒绝定量分析法和调查访问法。在本体论上，瓦尔迪显然认为伊拉克社会由政治与文化主导，而非粗暴还原的社会结构。从研究对象看，社会史关注默默无闻的受压迫者，瓦尔迪关注伊拉克普通民众及其隶属的社会组织，他通过分析游离于政治结构之外的部落在伊拉克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解释了伊拉克社会为什么会脱离政府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社会运行的非正式规则，如部落中的阿萨比亚（al-asabiyah，意为派系主义）以及庇护制度等恰恰是社会史中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范畴。

本阶段瓦尔迪的问题意识源于其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并构成了他思想中历史学的经验主义根基，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瓦尔迪的出生环境将他的研究引向了伊拉克宗派问题。瓦尔迪成长于浓厚的什叶派传统氛围中，他的出生地卡迪米亚在被列为巴格达市辖区之前，因为是什叶派的圣地，长期被列为独立行政单元。那里坐落着著名的卡迪米清真寺，该清真寺正是第七任伊玛目穆萨·卡迪米（Musa al-Kadhim）及其孙穆罕默德·贾瓦德·伊本·阿里·礼萨（Muhammad al-Jawad Ibn Ali al-Ridha）的陵寝，该寺同时葬有著名宗教学者纳迪尔·图西（Nadir Tusi）。因此，卡迪米亚不仅是什叶派信徒的聚居地，还是伊斯兰世界什叶派信众拜谒的宗教圣地。瓦尔迪认为伊拉克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的舞台，而两派冲突的催化剂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

^① Hamied G. M. al-Hashimi, “Iraqi Sociology and al Wardi’s Contributions,”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6, No. 2, 2013, pp. 251–260.

与萨法维帝国之间的政治、军事较量。^①

其二，成长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一手素材。首先，瓦尔迪并非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者，尽管他对理性科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常常使他穆斯林的身份受到非议。瓦尔迪的好友伊拉克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者侯赛因·阿里·马哈福兹（Hussein Ali Mahfouz，1926—2009）曾替他辩解道：瓦尔迪或许疏于礼拜，但从未怠慢自己的信仰，他只是单纯脱离了真主奴仆的身份进入了更高的信仰层次。^② 瓦尔迪出席公共场合随手携带的念珠，可以证明其穆斯林的身份。其次，瓦尔迪深谙伊拉克传统什叶派文化，他通过经常出入沙龙、咖啡厅等社交场所来保持与什叶派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最后，瓦尔迪在著作中喜欢引证宗教人物的言行与宗教经典原文，他引证的对象多是先知的逊奈、《圣训》和《古兰经》中的句子以及阿里的言行等。这说明，瓦尔迪并没有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只是主张宗教退回到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所以，读者所看到的瓦尔迪往往是理性的科学与感性的宗教并存的状态，“他的书写风格常常会同时包含社会科学的抽象概念和宗教文献的引文”。^③

从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视角分析，第二阶段瓦尔迪的创作有别于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研究对象聚焦于伊拉克社会；第二，历史学的维度在这一阶段占据了主要地位，社会学在本阶段反过来服务于历史学，成了分析的工具。例如，瓦尔迪通过对伊拉克社会史的宏观把控，运用了社会学的类型归纳和规律总结，推导和验证伊拉克派系主义的类型。但瓦尔迪对《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却做出了相对模糊的定性，他在总序中写道：“这套书就像一部历史书，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因为它不注重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思想和依据作为关注的重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便在于此。”^④ 在肯定该书作为历史学著作的同时，瓦尔迪有意强调该书通过现象揭露本质，寻求超越历史规律

^① 参见〔伊拉克〕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1册）（阿文版），第12~13页。

^② 参见词条“侯赛因·阿里·马哈福兹”（阿文版），知识网，2021年10月1日，https://www.marefa.org/محيي_علي_مفهوم。

^③ [美] 迪娜·里兹克·胡里：《汉纳·巴塔图与阿里·瓦尔迪的伊拉克历史与社会》（阿文版），《欧么朗杂志》2018年第6期，第17页。

^④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1册）（阿文版），第4页。

的社会学特征。可见，瓦尔迪在创作历程中虽然对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侧重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化，但不可否认两个维度共生于他的研究理路中，共同服务于他对伊拉克社会的研究。

二 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局限

瓦尔迪创作历程所体现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融通，指向了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即历史社会学。因其位于两学科的边缘，至今学界对其学科边界尚未达成共识。诚如吉登斯所言：“对学术的知识分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也并不必然存在着任何逻辑上或者说是方法论上的区别。”^① 但为了综合性地把握瓦尔迪思想，下文将其置于历史社会学的语境下，从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核心问题意识三个方面^②展开探讨。

第一，瓦尔迪发掘了伊拉克历史发展规律——“客观环境决定论”。历史社会学的重心在于寻求历史中规律的部分。^③ 伊拉克位于两河流域，其国土面积约 1/3 为可耕地，其余为气候干旱的沙漠地区，瓦尔迪认为这种客观环境缔造了“游牧与定居”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不同价值观是伊拉克社会问题（包括伊拉克人的人格）的根源。^④

瓦尔迪认为人格作为各种特征或特性的心理组合，往往与主导的社会文化相符合。^⑤ 他在《伊拉克人的人格》中指出，艰苦的沙漠环境缔造了贝都因人公正、自由、粗朴、坚忍、大方的品行，一旦生活环境改变，贝都因人的品行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他将伊拉克描述为熔炉，在这个熔炉中贝都因人最终被卷入城市化带来的定居生活的浪潮，并造就了伊拉克人的矛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41 页。

^② 赵鼎新认为历史社会学的重心在于寻求历史中规律的部分，追求历史学的时序性叙事和社会学的机制性叙事的整合，并且历史社会学的唯一问题意识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参见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中国政治学》2019 年第 2 期。

^③ 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中国政治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④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2 册）（阿文版），第 4 页。

^⑤ Ali al-Wardi, *Understanding Iraq: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rans. by F. Baali,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td. , 2008, p. 59.

盾人格。瓦尔迪举例解释道：“伊拉克男子选择妻子时，像个开明的西方人，与她私相授受，但如果得知自己的妹妹跟其他男子做同样的事情，则会变成贝都因人，不惜对他们进行荣誉谋杀，杀死他的妹妹及其情人。”^①

除了客观环境塑造伊拉克人的人格之外，瓦尔迪还认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受到政治的裹胁。这应是受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影响，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都与人们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意识形态”源于“政治冲突”；他呼吁建立自由的知识界，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不应受到社会等级组织或政治的控制。瓦尔迪反对被“政治操控的一切”，反对政治干涉宗教，反对政治操控知识分子。

瓦尔迪抨击被政权驯服的乌莱玛，批评立场受政治左右的知识分子。瓦尔迪通过《素丹的传教士》揭露哈里发和宗教阶层的真面目，认为哈里发从倭马亚王朝开始就以“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inin）之名行世俗帝王之实，乌莱玛阶层则受到了政治权力的操控和当权者的摆弄，所以称他们为“素丹的传教士”。^②但瓦尔迪看待乌莱玛的态度仍相对客观和辩证。在《人类心灵的闹剧》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乌莱玛的作用，但他赞扬了其中的改革者，包括埃及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al-Shaykh Muhammad Abduh）和黎巴嫩的穆赫辛·阿明（Muhsin Amin）。继否定乌莱玛在历史上的作用后，瓦尔迪犀利地指出独裁的政府用权力与金钱收买一切人的忠诚，尤其是知识分子。瓦尔迪认为历史上的作家无异于在市场上兜售商品的商人。在 1957 年出版的《高等文学的传奇》（*Uṣṭurat al-adab al-rafi*）^③中，瓦尔迪否定了宫廷诗人的作用。他认为在大众看来，在宫廷供职的诗人（Udaba' al-Salatin）只单纯为了知识而创作，但事实上他们依靠上层阶级的资助，为后者唱赞歌。他们不但脱离了被统治阶级，还在作品中蔑视下层民众。

瓦尔迪还相信客观环境决定了伊拉克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伊拉克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引发了宗派冲突，缔造了伊拉克与什叶派深厚的历

^① Hamied G. M. al-Hashimi, “Iraqi Personality in Light of Ali al-Wardi’s Works: A Critical Review,” *Sociology Study*, Vol. 7, No. 1, 2017, p. 3.

^② 参见〔伊拉克〕阿斯玛·阿卜杜拉·盖尼《阿里·瓦尔迪在〈素丹的传教士〉中的历史社会学思想》（阿文版），《艾代布杂志》2017 年第 122 期，第 137 页。

^③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高等文学的传奇》（阿文版），巴格达：拉比塔出版社，1957。

史因缘。首先，伊拉克坐落于朝觐要道，每年朝觐季节会有众多前往麦加的穆斯林取道于此，加之历史悠久的伊拉克因有多处名胜古迹吸引着外来游客，因此伊拉克无法避免与外来人群的频繁交往。其次，伊拉克位于伊朗与土耳其之间，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意识形态冲突的缓冲区。最后，萨法维王朝覆灭后到18世纪末，什叶派的文化中心从伊朗的伊斯法罕转移到了伊拉克的卡尔巴拉，随后什叶派文化中心又转移至伊拉克的纳杰夫至今。每年有大量的伊朗学生和商人来到伊拉克拜谒圣陵，求取什叶派宗教知识，传播意识形态等。部分伊朗学生在伊拉克完成宗教学校的学习之后，并不会回国而是继续留在伊拉克。这些伊朗人成为将伊朗的自然灾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传播到伊拉克的媒介。

正是对“客观环境决定论”深信不疑，瓦尔迪相信伊拉克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造就了他强调的伊拉克的特殊性。用他的话说：“我对此（将伊拉克人列入阿拉伯民族的同质化语境下探讨）表示反对，我想问他们，如何能在不研究小群体的情况下研究大社会？”^①

第二，瓦尔迪研究中有机结合了机制性叙事与时序性叙事。机制性叙事和时序性叙事分别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础分析逻辑。历史学家按时间序列叙事讲故事，社会学家追寻着结构/机制叙事找规律，而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就在于对这两种叙事进行整合。^②瓦尔迪的《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体现了这两种叙事的巧妙结合。

一方面，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六卷内容。第一卷考察了14~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帝国间的对峙如何影响伊拉克，尤其是发生在巴格达土地上的苏莱曼大帝与伊斯玛仪一世之间关于逊尼派和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二卷论述了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中心，被拿破仑入侵之后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以及对伊拉克的影响。第三卷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业、邮政业、电报、蒸汽机船、西式学校的出现如何影响奥斯曼帝国对部落的征服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爆发。第四卷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奥斯曼军队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对抗对部落的影响。第五卷用了两册内容探讨了1920年伊拉克反英起义的细节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反响。

① [阿尔及利亚]特拉奇亚·叶米娜：《阿里·瓦尔迪在塑造阿拉伯社会学中的贡献》（阿文版），《社会学前沿》2018年第16期，第151页。

② 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第113页。

这一卷分析了奥斯曼帝国丧失对伊拉克控制的过程，解读了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初步尝试。第六卷探讨了伊本·沙特的崛起与哈希姆家族的衰落如何引发 1958 年伊拉克革命，以及对塑造现代伊拉克和约旦的影响。明显时序性叙事中暗含着决定现代伊拉克社会的多重因子，如意识形态、军事力量、现代化发展、帝国势力干涉、部落与家族因素。

另一方面，瓦尔迪在该书中对伊拉克社会现象也进行了结构和机制层面的分析。以派系主义为例，最初伊本·赫勒敦以“阿萨比亚”来表述部落间由父系血缘构成的既具有凝聚力又具有离心倾向的状态。“我的兄弟是我的敌人，我的堂兄弟是我和我兄弟的敌人，整个世界是我和我的兄弟以及堂兄弟的敌人”^① 这句阿拉伯谚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阿萨比亚所描述的张力与合力在外部环境作用下此消彼长的状态。瓦尔迪将伊拉克社会的派系主义分为了三种类型。^② 一是部落派系主义，这是派系主义的最初级表现形式，指部落成员致力于保障本部落的生存与安危与其他部落斗争以抢夺生活资料。部落作为一个整体只服从自己的阵营而反对国内其他阵营。如此，在伊拉克形成了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单位的派系林立的状况。二是部落联盟派系主义又称为地方派系主义。顾名思义，部落联盟派系主义的主体是部落联合形成的政治联盟。组织形式上比部落派系主义更高一级，部落联盟有可能成为在地方上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并演变成一种地方派系主义。瓦尔迪认为部落联盟派系主义至今依然影响巨大，是造成地方分裂的主因。三是最高级别的宗教派系主义，即以共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教派派系主义。宗教派系主义包括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和两派各自内部教法派别的冲突。宗教派系主义相较于部落派系主义和部落联盟派系主义的范围更广。每当出现严重的教派冲突事件，伊拉克人民就会抛开部落和部落联盟派系主义；如果遇到他国入侵，就会抛开所有派系主义，将矛头转向外部矛盾。这种暂时性忘却内部敌人，燃起同仇敌忾情绪的集体主义甚至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的前身或者伊拉克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土壤。虽然瓦尔迪对民族主义甚少提及，但这不失为伊拉克民族主义产生的一种有效解释。瓦尔迪通过解构伊拉克社会划分派系主义，从而为社会矛盾的产生提出了机制性的解

^①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1 册）（阿文版），第 22 页。

^②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1 册）（阿文版），第 21 ~ 22 页。

释。这是瓦尔迪在继承伊本·赫勒敦思想基础之上的创新，所体现出来的结构与时间的关系也颇有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循环论的意味。

第三，瓦尔迪的核心观点是部落与部落精神阻碍了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① 与此呼应的是，瓦尔迪在《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中认为，在众多因子中，部落组织和部落精神是社会结构松散、身份认同涣散的主因，并且从根本上阻碍了伊拉克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导致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

在瓦尔迪看来，部落构成了近代伊拉克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意识形态的争斗、军事力量的较量、现代化的冲击和帝国势力干涉最终都作用在了部落身上。瓦尔迪对部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的消极作用进行了以下解释。

首先，部落的落后与现代性的进步格格不入。在谈及 1879 ~ 1880 年伊拉克爆发的一场大规模部落起义时，瓦尔迪生动地还原了部落落后的历史细节。曼苏尔·萨顿（Mansur al-Sadoun）领导部落武装占领了巴格达外围到巴士拉一带，随后宣布独立。萨顿领导的 1 万人左右的部落武装面对塔齐·丁·帕夏（Taqi al-Deen Pasha）将军领导的 2000 名奥斯曼正规军的镇压。这些正规军有野战炮，长期受德国规训。部落武装先使用驴子在战场上踢沙子来掩护部署，再用棉花塞住它们的耳朵，迫使这些驮畜作为敢死队向大炮前进，以迎接第一批火力射击。^② 在奥斯曼现代化的军队面前，落后的部落不免相形见绌。

其次，奥斯曼时期的定居政策扭曲了部落成员的性格。奥斯曼统治下的伊拉克有超过 3/4 的人口依附于部落组织。^③ 到 19 世纪中叶后，伊拉克部落从游牧转为定居的趋势愈加明显。一方面，政府力图将具有劫掠和对抗政府属性的游牧部落转化为维持秩序的代理人，最终使他们成为服从统治的顺民。另一方面，为了使部落从低效的游牧转为高效的农耕生产方式，1858 年，伊拉克政府颁布名为塔普（Tapu）^④ 的土地制度，规定凡在土地

^① 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中国政治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05 ~ 107 页。

^② Youssef H. Aboul-Enein, *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 pp. 40 ~ 41.

^③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1 册）（阿文版），第 21 页。

^④ 塔普：源自阿拉伯文 “التابووك”，意为地契。

上连续耕种 10 年及以上的人，即可获得该片土地的所有权。1932 年颁布的《平等法》使伊拉克政府进一步丈量、划定土地，用部落领袖的名字登记注册。这些政策使部落领袖摇身变成了大地主，而部落民则沦为佃农，还促进了部落领袖的官僚化，他们离开村庄去巴格达等城市居住，在那里他们不仅能过奢靡的生活，还可以结交高阶政府官员。瓦尔迪将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奥斯曼政府定居游牧部落的举措视为近现代伊拉克“游牧与定居”矛盾产生的历史节点。他批评了这些政策，认为它们将部落领袖变成了顺从的官员，从此效忠于国家而不为部落成员服务，而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糟糕。

复次，瓦尔迪认为部落主要受现实利益驱使，而民族独立则是次要考虑。在对伊拉克 1920 年革命的解读中，瓦尔迪认为英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满足部落的贪婪，而部落失败的原因则是纪律涣散。他解释说：来自贪腐的钱很快挥霍耗尽，资金无法维持革命；部落民随心所欲地加入或离开革命；由英国收买的间谍和线人渗透到伊拉克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部落当中；许多部落民参加起义不过是为了面子和荣誉，当公众对他们的支持动摇时，面子和荣誉也随之丧失，部落民因而放弃革命。^① 在瓦尔迪看来，荣誉与利益是部落追逐的对象，也是部落行为的根本驱动力。

最后，瓦尔迪批判了部落成员的劫掠行为和矛盾人格。他认为作为部落民的伊拉克人正是受到了贝都因文化的影响，奉行劫掠和派系主义的同时具有骑士精神，他们为了获得优势地位（al-Taghalub）不惜诉诸部落武力。^② 在法律层面和政府行为规范条款中，部落成员的劫掠行为本应属于犯罪，但是受“骑士精神”的影响，劫掠与偷盗在伊拉克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为人称道，甚至为之感到自豪的“英雄行为”，那些以打劫、偷窃为职业的人会受到其族人的尊重和歌颂。^③ 当部落民脱离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生活时，他们面对政府的代理人——税务官又变得异常恭顺。原本为了部落荣誉和同胞生存不惜诉诸血亲复仇行为的贝都因人，在定居的环境中甚至

^① Youssef H. Aboul-Enein, *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 p. 100.

^②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伊拉克社会性质研究》（阿文版），第 42 页。

^③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1 册）（阿文版），第 23 页。

能忍受政府官员的侮辱和殴打。^① 他们一方面保持着传统贝都因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承受着定居生活带来的心理压力。

因为对部落的过度关注，瓦尔迪否认群众动员的力量，拒绝以阶级的视角来分析伊拉克社会。在研究伊拉克的学者中，不乏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模式来分析宏观历史过程的学者，如伊拉克的侯赛因·卡西姆·阿齐兹（Hussein Qassem al-Aziz, 1922 – 1995）^②，还有美籍巴勒斯坦裔的汉纳·巴塔图（Hanna Batatu, 1926 – 2000）^③，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分析甚至是重构伊拉克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瓦尔迪却拒绝采用“群众动员”与“阶级”这样的字眼，他拒绝接受人民或者伊拉克不同阶级构成的民族作为一支有效力量在历史上崛起。他将伊拉克的一切反政府运动解读为不同程度的集体狂热，^④ 并以起义（wathab）和暴动（intfada）来表达“群众动员”中存在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以1920年革命为例，瓦尔迪认为这次革命并非普遍被认为的一场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革命，而是部落首领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暴乱。该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在伊拉克并非所有的革命都以混乱收场。比如，在1958年推翻君主制的政变中，除了主导的军队，群众的参与是自发且无组织的，但是这场政变并没有最终演变为暴力失控和肆意抢劫，足以说明当时群众受民族主义信念驱动。因此群众动员不能简单地被“游牧与定居”的生活方式所区分，“阶级”不能简单地被“部落”所替代。更进一步分析，瓦尔迪思想的局限性也源自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之一，历史维度的引入实际上是分析人的行为选择，排除历史诸多可能，使之走向社会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趋向社会学的本质。由此造成的向社会学思想天平的倾斜，是瓦尔迪思想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①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伊拉克社会性质研究》（阿文版），第86页。

^② 侯赛因·卡西姆·阿齐兹，伊拉克历史学家，先后在巴格达大学和摩苏尔大学任教。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阿塞拜疆人民对阿巴斯哈里发的反抗》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分析法，因此在学界引发争议。

^③ 汉纳·巴塔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伊拉克与叙利亚近现代史，其历史研究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代表作为《旧社会阶级和伊拉克革命运动》（*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叙利亚的农民阶级》（*Syria's Peasantry*）。

^④ 参见[伊拉克]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1册）（阿文版），第8页。

三 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对瓦尔迪的批评和质疑不无其道理，但瑕不掩瑜，其思想具有对现实的“揭示性”和对未来的“预见性”，影响了当代伊拉克知识分子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学者。瓦尔迪以社会学与历史学并举的研究方法，成了阿拉伯社会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推动了伊拉克历史学的发展。

第一，瓦尔迪思想具有对现实的“揭示性”和对未来的“预见性”。之所以历史社会学以发现历史规律为研究重心，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次含义在于历史社会学往古而知今的学科定位。瓦尔迪对历史的追溯，都始于对社会现实的“揭示”，终于对未来趋势的“预判”。

例如，“无意识理论”体现了瓦尔迪对伊拉克教育的思考，他认为无论是西式的还是宗教式的伊拉克学校，仍然基于对理性和自主意识的过时信念在运作，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① 也就是说，伊拉克学校传授知识依然以坚信理性和自主意识能够指导人的行为为基调，这有悖于瓦尔迪坚持的“客观环境决定论”。瓦尔迪分析伊斯兰早期诗人受到统治者的摆弄，意在呼吁现代伊拉克人文科学的客观性，反对政治操控知识分子。他举例说，某报纸的编辑赞扬某一政治家的行为导致公众拒绝接受该编辑的报纸，编辑不但不明白公众拒绝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对这种赞助制度的憎恶，反而抱怨作家地位下降。编辑不明白知识分子对政治赞助人的依赖导致公众对他们的不信任，而作为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没有被作家履行，使“国家”和“人民”这两个词变得毫无意义。^② 瓦尔迪以倭马亚诗人^③为例，指出哈里发以优厚的俸禄和奖赏笼络诗人，使他们为其合法性辩护以达到

^① [伊拉克]阿里·瓦尔迪：《无意识的奇迹：成功人格的超心理学秘密》（阿文版），第 18 页。

^② Orit Bashkin, “Advice from the Past: ‘Ali al-Wardi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Jordi Tejel, Peter Sluglett, Riccardo Bocco, Hamit Bozarslan, eds., *Writing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Histori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p. 25.

^③ 最具代表性的阿赫塔尔（al-Akhtal），他身为基督徒是倭马亚王朝世俗化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会应要求讽刺哈里发叶齐德的政敌，哪怕对方同为基督徒教胞。倭马亚王朝时期的三位著名诗人阿赫塔尔（640 ~ 710）、贾里尔（650 ~ 728）与法拉兹达格（641 ~ 728 / 730）有“诗坛三杰”之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权者——哈里发的赞助，因此他们常为赞助者作颂扬诗，为其政敌作讽刺诗。

巩固统治的目的，意在呼吁知识分子应该为了知识而创作，不要屈从于政府，更不要为了兜售自己的作品陷入迎合低俗趣味的陷阱。

瓦尔迪反对历史上素丹的独裁统治，主张宗教与政治脱轨的改革主义，意在呼吁现实中的自由与民主。他认为身处变革中的伊拉克应适时建立民主制度，他说：“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机会。伊拉克正处在十字路口，正是实现民主制度的时机。”^① 民主制有利于解决瓦尔迪最关注的伊拉克现实问题——派系主义，他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打破宗派主义的藩篱，这种民主制度表现为根据人口比例建立一个包括各类群体的政府”。^②

瓦尔迪的“客观环境决定论”中还隐含着对伊拉克社会的预判。瓦尔迪曾论及两伊因地理和历史因缘纠葛互相影响，比如伊拉克曾多次受瘟疫侵扰，奥斯曼帝国每十年就会暴发一次大瘟疫，只要邻国暴发瘟疫，必然会波及伊拉克。这个观点对 1980 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塔卡克事件^③具有预见性。^④ 再比如审视美国入侵之后的伊拉克社会，美国和英国在结束萨达姆统治之后并没有给伊拉克带去新的秩序，反而使抢劫活动更为猖獗。当时包括官员的官邸、私人住宅、政府机构、大学、国家图书馆乃至举世闻名的巴格达博物馆惨遭洗劫。瓦尔迪对贝都因文化中的劫掠属性的解释也一定程度预见了伊拉克战后乱局。另外，比如其关于部落领袖演变为顺从官员的论断也直指当今伊拉克官僚体系。正因瓦尔迪思想所体现的“揭示性”和“预见性”，美国军方才对研读其作品极为重视，声称必须像冷战时期研究苏联文献一样，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研究瓦尔迪的作品。^⑤

第二，瓦尔迪对自由和民主以及学术客观性的呼吁影响了当代伊拉克

^① [阿尔及利亚] 特拉奇亚·叶米娜：《阿里·瓦尔迪在塑造阿拉伯社会学中的贡献》（阿文版），《社会学前沿》2018 年第 16 期，第 151 页。

^②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伊拉克社会性质研究》（阿文版），第 383 页。

^③ 两伊战争前夕即 1980 年，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地区发生暴乱，萨达姆处决了在伊拉克最具影响力的什叶派教长巴克尔·萨德尔（Baqir al-Sadr），将大约 35000 名被认为是伊朗后裔的伊拉克什叶派人士驱除出境。萨达姆在 1980 年 9 月废除 1975 年两伊签署的《阿尔及尔协定》时说：“伊朗的统治阶级坚持利用宗教煽动阿拉伯世界，以使阿拉伯世界处于困境。宗教祈祷是掩盖波斯种族主义的面具，必定会使阿拉伯民族恼怒。”参见 Adeed Dawisha,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3, No. 4, 1999, p. 557。

^④ 参见 [伊拉克] 阿里·瓦尔迪：《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第 1 册）（阿文版），第 11 页。

^⑤ 参见 Youssef H. Aboul-Enein, *Iraq in Turmoi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Dr. Ali al-Wardi,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King Feisal*, p. 25。

知识分子。复兴党执政正值伊拉克依靠石油获利时期，政府以财政鼓励发展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文化事业。当知识分子对政府财政支持纷纷趋之若鹜时，瓦尔迪坚持“伊拉克人与社会的特殊性”，拒绝赞颂复兴党鼓吹的阿拔斯黄金时代和响应泛阿拉伯主义。这一度使他的处境非常尴尬。作为知名学者，瓦尔迪一度被边缘化。在《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梦境》一书中他表达了对所遭冷遇的抱怨：革命时期很少有人读他的书，因为那时人们的品位发生了变化。伴随新时代而来的是新一代的写手，他们为迎合当权者和大众的品位而生产作品（而非写作），以此来代替对“客观”作品的需求。^① 但仍有知识分子没有恭顺地成为复兴党的合作者，他们践行了瓦尔迪的主张，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那些流亡在伊拉克之外的诗人和作家，如阿卜杜勒·瓦哈卜·巴亚提（Abd al-Wahhab al-Bayati）、加布·图玛·法尔曼（Ghaib Tuma Farman）、布兰德·哈伊达里（Buland al-Haydari）^②、穆罕默德·迈赫迪·贾瓦希里（Muhammad Mahdi al-Jawahiri）和萨迪·优素福（Sadi Yusuf）乃至当下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流亡作家、媒体人。这些知识分子仍然忠于半个世纪前由瓦尔迪制定的路线。他们中有人甚至因拒绝参与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压迫活动而一度遭到迫害。当学者们思考如何为多元族群构成的伊拉克社会构建同质化的文化与集体认同时，瓦尔迪的作品或许可以激励伊拉克的年轻一代学者成为世俗的、关注民主与社会正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第三，就伊斯兰世界而言，瓦尔迪的思想影响了伊朗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Ali al-Shariati）。有阿拉伯学者认为瓦尔迪思想影响了阿里·沙里亚蒂。^③ 除了伊拉克与伊朗天然的地理和历史因缘使得瓦尔迪的思想极易传播到伊朗外，二者的经历和思想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其一，沙里亚蒂在其著作《阿拉维的什叶派与萨法维的什叶派》（Alawite Shiism and Safavid Shiism）中效仿瓦尔迪反对政治中存在的宗教因素，认为宗教会导致政治理想

^① [美] 迪娜·里兹克·胡里：《汉纳·巴塔图与阿里·瓦尔迪的伊拉克历史与社会》（阿文版），《欧么朗杂志》2018年第6期，第17页。

^② 阿卜杜勒·瓦哈卜·巴亚提（1926～1999）是伊拉克著名诗人，阿拉伯新诗派的代表人物；加布·图玛·法尔曼（1927～1990）是伊拉克左派现代小说家；布兰德·哈伊达里（1926～1996）是伊拉克著名左派诗人，库尔德裔。

^③ [阿尔及利亚] 特拉奇亚·叶米娜：《阿里·瓦尔迪在塑造阿拉伯社会学中的贡献》（阿文版），《社会学前沿》2018年第16期，第144页。

主义。换言之，宗教不适合民主政治。沙里亚蒂也批判政权与乌莱玛之间的合作，认为他们在人民中传播病态思想（如禁欲主义、渴望来世）的同时，却在现世执着于宗教仪式，让腐败者享受美好的生活。其二，沙里亚蒂也像瓦尔迪一样呼吁学术的客观性。他在《自由知识分子的使命》（*Mission of a Free Thinker*）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变革者、革命者、殉道者，他们不接受暴政，不接受傲慢的神职人员的操控。但显然生活的不同境遇不仅使沙里亚蒂的批判态度更为尖锐，还塑造了他激进的意识形态斗士的形象。而瓦尔迪的研究从未有过诉诸政治、鼓励革命的尝试，更从未试图将其思想意识形态化。^① 因此，在复兴党执政期间瓦尔迪的生命不至于遭到威胁。

第四，瓦尔迪是阿拉伯社会学的奠基人和伊拉克社会史转向的先驱。瓦尔迪作为阿拉伯社会学奠基者，创建了伊拉克社会学系，参与筹建了开罗大学社会学系，培养了一批社会学研究者。比如，伦敦国际伊斯兰科学学院（ICIS）的社会学教授哈米德·G. M. 哈希米（Hamied G. M. Al-Hashimi）曾出版《阿里·瓦尔迪博士与阿拉伯和伊拉克社会研究》^②（*al-Duktur · Ali al-Wardi wa-dirasat al-mujtama·ayn al-‘Iraqi wa-al-‘Arabi*）推广瓦尔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美国社会学家福阿德·G. 巴利（Fuad G. Baali）^③ 在其专著《阿拉伯的统一与不统一》（*Arab Unity and Disunity*）的序言中坦言：该书受到了瓦尔迪的启发，在他出版的作品中，强调了游牧文化中的阿萨比亚在任何阿拉伯国家联盟、联邦和统一中发挥的作用。^④ 这两位活跃在西方学界的阿拉伯裔社会学学者作为瓦尔迪的学生，继承了他研究伊拉克社会方法的同时将其类推到阿拉伯世界，并将瓦尔迪的思想带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视野。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社会学无用论”在阿拉伯学界一度甚嚣尘上。^⑤ 阿拉伯学者纷纷表态认为：阿拉伯社会学面对变革之所以会束手无策，是

^① [伊拉克] 阿卜杜·贾巴尔·拉菲伊：《阿里·沙里亚蒂和阿里·瓦尔迪》（阿文版），思想研究中心网，2020年12月30日，<https://afkaar.center/2020/12/30/%D8%A7%D9%84%D8%A7%D9%8A%D9%84-%D8%A7%D9%84%D9%88%D8%AF%D9%8A-%D8%A7%D9%84%D8%A7%D9%84%D9%8A%D9%84/>。

^② [荷兰] 哈米德·哈希米：《阿里·瓦尔迪博士与阿拉伯和伊拉克社会研究》（阿文版），巴格达：阿德南出版社，2011。

^③ 福阿德·巴利，美籍伊拉克裔社会学家，西肯塔基大学荣休教授，曾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巴格达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科威特大学任教。

^④ Fuad G. Baali, *Arab Unity and Disunit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4, p. 1.

^⑤ 《阿拉伯社会学：面对变革是否束手无策》，<https://www.alfaisalmag.com/?p=21158>，2021年7月1日。

因为政治环境的限制导致社会学研究无法及时获取材料从而与现实脱节，社会学沉迷理论研究，或是急于剔除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而且由于物质条件匮乏而无法完善培养体系，使社会学人才青黄不接。瓦尔迪似乎是一个例外，他至少印证了 20 世纪文化复兴时期阿拉伯社会学的一段辉煌历程。

就伊拉克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而言，《当代伊拉克历史学家百科全书》(*Mawsu'ah A·lam al-mu'arrikhinal·Iraqiyin Asatir al-mu·asirin*)^① 的作者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认为瓦尔迪站在了伊拉克社会史研究的“最前沿”，正是因为他的深入研究，才促使伊拉克历史研究转向文化史研究。^② 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影响，伊拉克社会史的研究常常囿于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阶段和区域史的研究范围，现代伊拉克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瓦尔迪的《现代伊拉克历史的社会掠影》显然成为现代伊拉克社会史研究成果中的典范。总体而言，瓦尔迪两学科并举的方法，呼应了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融通，当时社会学家从纷繁的变迁中寻找时间赋予的启示，历史学家则在年鉴学派几代人的努力下将研究兴趣从传统政治史转移到社会史。

结语

瓦尔迪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并举的研究路径，为突破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壁垒做出了贡献，呼应了西方历史社会学的风潮，为伊拉克乃至阿拉伯学者在世界历史社会学发展历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独树一帜的方法论与题材选择对于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更值得强调。首先，1945~1970 年，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史学书写范式在阿拉伯历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③ 西方学界多以此为切入点研究伊拉克史学，瓦尔迪的社会史研究是对这种褊狭视野的有益补充。其次，瓦尔迪并没有因为在西方学术氛围中的长期浸

^① [伊拉克] 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当代伊拉克历史学家百科全书》，摩苏尔：伊本·艾希尔出版社，2011。

^② [伊拉克] 易卜拉欣·赫利勒·阿拉夫：《是否存在伊拉克历史学派？》（阿文版），文明对话网，2011 年 5 月 4 日，<https://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259000>。

^③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ical Writing,” 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96.

染而完全照搬西方理论，他对伊本·赫勒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不仅与历史社会学的内核相契合，也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采用阿拉伯传统理论的成功尝试。最后，与瓦尔迪同时代的美国历史社会学“三驾马车”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无一例外都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而瓦尔迪的研究对象是第三世界的伊拉克社会，是他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尝试。瓦尔迪打破西方话语权构筑的思维框架，继承阿拉伯人自己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特色的创新，这使他的思想卓荦不凡，值得学界更多地关注。

[责任编辑：黄麟]